

取象比类——中国式隐喻认知模式^{*}

□马子密 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 :取象比类作为传统中医理论主要的建构工具,在中医概念形成、理论系统构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运用现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隐喻,对取象比类的结构、机制等诸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取象比类的实质就是“中国式隐喻”的结论。从隐喻视角揭示传统中医理论的构建机制和认知过程,有利于解读中医语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中医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它为什么这样说以及蕴含了什么等诸多问题。

关键词 :认知科学 取象比类 隐喻认知 概念隐喻

doi: 10.3969/j.issn.1674-3849.2012.05.026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的人文科学领域发生了一场“认知革命”,以人类认知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认知科学迅猛发展起来,表现为语言学、心理学、哲学、逻辑学、人工智能等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研究态势。如果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中医理论的建构问题,那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医理论“是什么”和“为什么”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

一、中医理论建构的认知工具——取象比类

传统中医理论历经了一个漫长的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不断冲突、交汇的历史过程,最终得以建立并系统化。在这个理论建构过程中,认知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目前学界公认,取象比类是建构

中医理论的主要认知工具。

取象比类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正是在对于“天”、“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诸身”、“诸物”等自然、社会客观事物的感性观察、理性类比的基础上;“于是始作八卦”,《周易》因而诞生,从此演绎了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黄帝内经》中多处明确提到“比类”的说法,如“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素问·示从容论》),“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素问·示从容论》);“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素问·疏五过论》);“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素问·征四失论》)等等。在《黄帝内经》中还明确记载了所引用古文献《比类》(仅有书名)。可知,作为中医理

收稿日期:2012-09-19

修回日期:2012-10-1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973971):基于认知语言逻辑心理的中医病因病机概念隐喻研究,负责人:贾春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173464):“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与动态认知逻辑刻画,负责人:贾春华;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090013110012):基于认知语言学的中医病因病机概念隐喻研究,负责人:贾春华。

^{**} 通讯作者:贾春华,本刊编委、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基于认知科学的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研究、张仲景合方理论与临床实践, E-mail:jiachunhua555@yahoo.com.cn。

论经典的《黄帝内经》其理论构建的方法论与《周易》一脉相承,即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象思维方法。所谓“意象”,就是经过人为抽象而提炼出来的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或符号。一方面它通过形象性的概念与符号去理解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带有直观性的类比推理形式去把握和认识对象世界的联系。这种意象思维被古代中医理论的建构者们所继承,并演化为传统中医认知的重要方法——取象比类。

何谓“象”?《周易·系辞传》:“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可见,古人所取之“象”,为肉眼可以看见或感官可以感知的天下万物之属性。《素问·示从容论》又有“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的说法,此中明确“比类”的依据是“援物”,即假借于世界万物。何谓“类”?一方面指对事物的综合归类,另一方面指事物的相似或相同。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意象思维而言,“比类”就是经过认知者提炼比较后,对事物相似或相同属性的抽象归类及综合。所谓“比”,必然要有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参与者。结合《黄帝内经》是一部专门探讨关于人体生理、病理、治疗、预防、养生的中医经典之作,可以确定“人体”必然是参与“比”的一方。综上所述,参与“比”的另一方必然是人身之外的宇宙万物。简言之,对于中医理论而言,取象比类就是一种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与宇宙万物属性进行比较归类,进而认识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认知工具。

对于认知活动而言,还有一个具体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古人概括为“应象”。在《黄帝内经》中,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篇名外,还有一处提及“应象”。“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脏之脉”(《素问·宣明五气》)。“应”,响应、对应义。具体而言,可以指相参照比较的两种事物之间,某种属性或规律相似或相吻合。“取”的是人身之外宇宙万物之“物象”。“比”的是人体生理病理之“现象”,对“物象”和“现象”进行类比推理而得出结论的思维过程,即为“应象”。只有两“象”相“应”,“相应”的标准是要达到“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素问·金匱真言论》),这样才算一次成功的取象比类,其结论才会有意义。

关于取象比类,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取类比象,最早见于南京中医学院编写《中医学概论》,此后关于取类比象的称谓在中医界不乏其声。到底应该是“取象比类”还是“取类比象”呢?《黄帝内经》中明确记载“比类”一词共有9处,其中有“明引《比类》《从容》,是以名曰诊经,是谓至道也”(《素问·示从容论》),说明《比类》为专论“比类学说”的古文献,只有“比类”之说,绝无“比象”之论。再者,结合上文关于取象比类的意义阐释,应该是“取象”在先,“比类”随之。而且对获得的感性材料(取象)进行抽象处理(比类),以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更高的层面^[1],这也符合思维的一般逻辑。因此,应该是“取象比类”而非“取类比象”。

二、现代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工具——隐喻

现代认知科学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就是对传统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的认知深度扩展。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无论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隐喻比较论还是以昆体连为代表的隐喻替代论,隐喻仅仅被看作是文学中的一种修辞现象,是文学语言中的装饰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理查兹隐喻互动论的提出,隐喻才得以跳出了狭义的修辞学范畴,转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认知范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隐喻映射论的提出,明确了隐喻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人类的语言、思想、行动本质上都是隐喻的,从此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拉开了序幕。

通俗地讲,人们想对一些不熟悉、不了解的抽象事物进行认知时,必须借助某种工具或中介,通过这种中介,利用人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事物或概念来认识未知的、无形的、抽象的事物或概念,这种工具或中介就是隐喻,这个过程就是隐喻认知。简言之,隐喻就是“用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概念”的命题,是人类进行抽象思维、理解抽象概念的主要途径。

隐喻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语义冲突。所谓冲突,必然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故提及隐喻,必然要同时涉及两个分属不同范畴的概念。中国传统修辞学的“本体”和“喻体”、理查兹的“tenor(本体)”和“vehicle(喻体)”,莱考夫和约翰逊的“target domain(目标域)”和“source domain(源域)”等都指出了隐喻所涉及的两个方面。因此,隐

喻的结构性特征在于有两个对象,且两个对象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范畴)。

理查兹曾明确指出“思维是隐喻性的并通过比较而展开”,布莱克也应和了这一观点,而英德伽更进一步强调“隐喻中的比较为一切认知的根本”。如果说隐喻是思维和认知活动的根本,那么“比较”则是隐喻的根本。所谓“类推”、“投射”、“互动”,无一不以“比较”为前提并从“比较”中获得驱动力。所以说,思维和认知活动的核心机制就是隐喻性的互动“比较”^[2]。而“比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发现二者间跨范畴的“相似性”^[3],隐喻中的两个对象藉“比较”使隐喻义得以产生,其不同的“比较机制”则形成了如互动论、映射论、空间合成论等诸多现代隐喻理论。

三、取象比类与隐喻

如前文所言,取象比类是古代中医先贤们对人體生理病理规律的认知工具。按照现代认知科学的观点,对于现实世界规律的抽象认识往往是隐喻性的,因为“隐喻渗透于日常生活,不但渗透在语言里,也渗透在思维和生活中。我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在本质上基本上是隐喻的”(Lakoff & Johnson,1980)。从逻辑上来说,人體生理病理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人们对它的认知也应该是隐喻性的。如果把现代隐喻和中医理论的认知工具取象比类之间进行比较,会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呢?

首先,从结构要素而言,取象比类需要“比类”的两端,一端为人體生理病理现象,另一端为人身之外的宇宙万物的物象;隐喻的结构性要素需要两个分属于不同领域(范畴)的对象,隐喻互动论称其为“tenor(本体)”和“vehicle(喻体)”,隐喻映射论称其为“target domain(目标域)”和“source domain(源域)”,隐喻结构论称其为“target situation(目标情景)”和“source situation(源情景)”。可见,取象比类与隐喻在认知结构要素方面是一致的,都需要两个比较端。

其次,隐喻义得以形成的媒介来自于两个对象间的比较。这里所说的“比较”并不仅仅限于“发现”已有的相似,它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相似^[2]。通过比较,隐喻义得以形成,互动、映射、空间合成等隐喻生成理论,无不以比较作为驱动力;取象比类也

是以比较作为联结认知起点和终点的媒介,通过比较,人身之生理病理存在和发展规律通过人身以外世界万物之运动变化规律得以彰显。因此,隐喻和取象比类在“比较”这一认知媒介上也是相通的。

再次,就是双方经过比较得出结论的过程。对于隐喻研究来说,就是一个隐喻意义生成的过程。由于其过程及运作机制的复杂性,因而形成了目前各种隐喻理论交相辉映、各有建树、互有补充的学术局面。如理查兹的互动论认为,一个带有隐喻意义的词或短语是在该语境下代表两种事物的概念——“tenor(本体)”和“vehicle(喻体)”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包容性的意义。理查兹把“tenor(本体)”和“vehicle(喻体)”之间的相似性称为“ground(喻底)”。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映射论认为,隐喻意义的生成是由“source domain(源域)”向“target domain(目标域)”的映射。“域”的概念蕴含了隐喻背后所涉及的宏大的意义网络。“映射”则指出从源域向目标域是有方向性(单向性)的互动。映射论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变原则”,即源域重要的、显著的结构关系(意向图示结构)会被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中,隐喻义由源域的意义和结构来决定,但目标域本身的结构会对源域要映射的结构进行限制,即对某些不适合目标域本身的结构或意义进行“过滤”。弗克涅的合成空间论认为,隐喻意义(合成心理空间)的生成来自于其他3个心理空间的互动,即源心理空间、目标心理空间和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的上位心理空间(类属空间)。斯坦哈特的结构隐喻论认为,大多数隐喻都建立在“source situation(源情景)”和“target situation(目标情景)”的类比基础之上,每个情景都包含了具有某些属性的相互关联的个体,每个隐喻义都有自己的逻辑真值条件,即源情景中的个体要能和目标情景中的个体形成配对物对应(counterpart correspondence)。隐喻的比较应该发生在情景间而不是个体本身之间,不同的真值对应不同的语境条件,语境是隐喻义的真值条件之一。

如前所论,取象比类与隐喻在认知结构要素、认知媒介上都是相通的。然而,在认知机制和过程方面,古人只是以一个简单的“应象”概括之,并没有对“应象”作具体的说明,虽然表述简洁,但非常抽象而突兀。回顾上文关于现代隐喻理论对隐喻生成机制及过程的揭示,可以发现,对隐喻必然要涉及“比较”的两端——“源”和“目标”的概念定位,也

有一个从“词/短语”(具体性)→“域”(平面性)→“空间”(立体性)→“情景”(更加生动而综合的立体性)的认知逐步深化和丰富的过程。基于大量心智研究成果的现代认知研究尚且如此,考虑到2000多年前古人认知世界的客观局限性,要把这个复杂的机制和过程说清楚,可以想见它的难度,因而古人更多地强调“直觉地领悟”^[4]。

我们只知道古人运用的是基于比较的类比推理方法,具体的类比推理过程我们可以借用上述现代认知理论尝试证明。例如,“心者,君主之官”(《素问·灵兰秘典论》),直译即“心是君主之官”。比较的两端分别是“心”和“君主”。按照隐喻映射理论,相对具体的概念为源域,此处源域即封建政体结构中的核心“君主”;相对抽象的概念为目标域,此处目标域即中医脏腑之一“心”。按照隐喻映射理论,该认知过程即如何完成从源域(君主)向目标域(心)的单向映射过程,也就是一个关于“君主”的意向图示结构向关于“心”的意向图示结构映射的过程。其映射过程可以概括如下:一是中心-边缘意向图示:作为君主,虽然是整个国家政体结构中的一部分,但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君主的个人意志通过旨意向天下颁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心是人体脏腑组成的一部分,但心藏神而主神明,根据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形神虽然统一,但神比形要重要的多,神统领着形;“脏腑百骸,惟所是命”。二是上下方位意向图示:君主居于庙堂中心之皇宫,常有“龙庭”之谓,其他功能机构、臣子百姓均围绕禁城而居;心居于位处上焦之“膻中”之宫,心外有“心包”护卫,其他脏腑在心下依次分布排列,未有位高于心者。三是链接意向图示:《易经》第一卦是乾卦,乾为天为阳,乾卦六爻取龙为象。古人认为,龙无所不能,既能潜于水中,又能出行地面,还能飞入云天,是最具有阳性活力者,所以历代君王常以“真龙天子”自居,形容天子之怒为“雷霆之怒”;心在五行属火,纯阳而具有温煦、推动作用,是万物生长变化的最高主宰者和决定性动力,也是人体生理功能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古人形容心火亢盛为“烈火逼则土有死气而成焦土”。四是链接意向图示:君主对于国家土地所出万物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天下万民的物质分配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和政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心主血;“诸血者,皆属于心”(《素问·五脏生成篇》);“心主脉”(《素问·宣明五气篇》),也就是说,

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物质及其输送都主要取决于心的功能。经过如上意向图示相互对应,“心者,君主之官”的隐喻意义得以彰显:“君主”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相似或相近于“心”在人体脏腑中的地位和作用;“君主”对于国家和社会有多重要,那么“心”对于人体就有同样程度的重要性。“心者,君主之官”的概念一旦明确,那么,在人体生理阐述、病机确立、预后转机等诸多方面将会深刻影响临床辨证施治,也才会有诸如“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素问·灵兰秘典论》)等重要推论。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传统中医的取象比类认知方法可以称其为“中国式隐喻”的认知模式,现代隐喻认知与之具有人类思维方法的“同源性”。

四、取象比类的局限性及中医的对策

取象比类有局限性,《庄子·天道》:“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传统中医也有“医者,意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都是这种局限性的表达。其实,取象比类的类比推理本质已经决定了其结论为“或然性”的必然。当然,即便是现代逻辑学的经典方法之一——归纳推理法,也同样在其结论的合理性方面难以确保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这也是现代归纳逻辑学(概率逻辑学)脱颖而出的实在动力。虽然现代归纳逻辑学仍处于发展时期,理论也尚待完善,但丝毫不影响其在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统计学、决策论、人工智能等众多学科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同理,取象比类也同样在现代中医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点,对于这种“或然性”的可靠程度(逻辑真值)而言,中医理论的构建者们在理论成熟之初就早已认识到并提出了中医自己的解决之道——“辨证论治”。历代中医学家也无不强调这一点,认为这是中医临床取得疗效的根本。中医所强调“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就在于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来“实证”辨证结论的“真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克服类比推理只“求同”的弊端,在“相似性”中兼顾“差异性”。简而言之,中医没有也不提倡如某类或某种西药一般普遍适用的“通药”,而是提倡对“当前证”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辨治”,通过长期的、反复的临床实践和总结体悟,努力使这种“或然

性”无限地向“必然性”接近。这种有点无奈甚或残酷的困境,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恐怕也是整个中医事业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现实。

当然,如果仅仅把取象比类定位于一种原始的、朴素的类比推理思维的话,显然低估了它在传统中医领域和传统中国文化领域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单从中医领域来说,取象比类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广涉自然、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认知语料财富。学术无国界,既然取象比类的本质是“中国式隐喻”,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现代认知科学理论对

其深度发掘。这样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医,使传统中医概念和理论的构建机制和认知过程更加明晰,同时对中国本土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 1 屠执中.到底是“取象比类”还是“取类比象”.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6,40(10):2.
- 2 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5.
- 3 贾春华.中医学: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亚太传统医药,2009,5(1):11-12.
- 4 周立斌.比类取象、直观外推的传统思维方法.长白学刊,1996,5:27.

Analogueism——A Cognitive Model of Chinese Metaphor

Ma Zimi, Jia Chunhua

(Preclinical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nalogueism which is regarded as a majo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cept design, theory systematization and so on. Using the core theoretic tool of modern cognitive science (metaphor), we have compared and analyzed structures, mechanisms and other elements of analogueism to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substance of analogueism is "Chinese metaphor". This paper is valuabl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CM. It gives some enlightenment as well to practically understand basic issues of TCM, such as what the exact language of TCM is, why it says in that way, what the exact meaning is and so on.

Keywords: Cognitive science, analogueism, metaphorical cogni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责任编辑 李沙沙 张志华, 责任译审 王 晶)